

# 關著弄文學的人

——《建塔者》、《亡明講史》中的焦慮

楊 鎮 宇\*

## 提 要

本文檢視臺靜農渡海前兩部重要小說——《建塔者》與《亡明講史》，分析兩部作品如何呈現「知識分子／文人」身分的焦慮。《建塔者》中，臺靜農透過知識青年的視角，呈現出關著弄文學的青年知識分子在革命洪流中的頹廢與無力。作品中反覆出現的知識青年，既對革命者的犧牲感到崇敬，又為自身的怯懦與無所作為深感愧疚，這種矛盾心理構成臺靜農對知識分子身分的批判與反思。《亡明講史》則轉向歷史書寫，聚焦晚明士大夫在國家存亡之際的道德抉擇。臺靜農透過辛辣的筆觸，描繪錢謙益等變節文人逢迎新主的行徑，揭示出文化與

---

本文 114.02.14 收稿，114.07.14 審查通過。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三年級。

DOI:10.29419/SICL.202507\_(60).0006

---

知識在亂世中如何失效。本文採文本細讀與歷史脈絡對讀法，指出臺靜農的焦慮體現了知識分子在時代中的困境。他所書寫的知識分子或激進或頹廢，或忠貞或變節，既是時代的反映，也是他對自身身分的投射與追問。

**關鍵詞：**臺靜農、文人、知識分子、《建塔者》、《亡明講史》

# The Self-Seclusion of the Literati:

## Anxiety in Tai Jingnong's *Tower Builder* and *History on the Collapse of Ming Dynasty*

Yang Chen-yu\*

### Abstract

This article scrutinizes two important short story collections by Tai Jingnong (臺靜農)—*Tower Builder* (《建塔者》) and *History on the Collapse of Ming Dynasty* (《亡明講史》)—published prior to his migration across the strait, analyzing how they articulate the anxiety embedded in the identity of the "intellectual/literatus" (文人).

In *Tower Builder*, the recurrent motif of the young figures are marked by profound ambivalence: a simultaneous reverence for revolutionary sacrifices and an acute sense of guilt over their own cowardice and inaction. This psychological contradiction forms the core of Tai's critique and reflection on the intellectual identity.

In *History on the Collapse of Ming Dynasty*, conversely, through a pungent and critical prose, Tai depicts the compromising conduct of turncoat literati, such as Qian Qianyi (錢謙益), as they curry favor with the new regime,

---

\* M.A.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thereby exposing the ultimate inefficacy of culture and knowledge in times of social upheaval.

Employing a methodology that combines close textual reading and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historical context, this article posits that Tai's depictions of intellectual anxiety embody the existential predicament of the individual in his era. The intellectuals he portrays—whether radical or decadent, loyal or defecting—are not only reflections on historical moments but also projections and interrogations of his own identity as a literati.

**Keywords:** Tai Jingnong(臺靜農), Literati, Intellectual, *Tower builder*(建塔者), *History on the Collapse of Ming Dynasty*(亡明講史)

# 關著弄文學的人

——《建塔者》、《亡明講史》中的焦慮

楊 鎮 宇

## 一、前言

臺靜農（1902-1990）的短篇小說集中創作於 1925 至 1930 年代初，其創作歷程與五四後的文化激變、左翼運動及知識分子的困境息息相關。彼時正值社會動盪、傳統價值解體，新文化正在形成，臺靜農一輩知識分子位於革命與反革命、傳統與現代之間的歷史節點上，形塑出一系列自我分裂、內在困頓的知識分子形象，他們既嘗試介入現實、尋求變革，卻又經常陷於無力行動與價值迷失的矛盾當中。

回顧中國歷史上的知識分子，先秦開始出現稱為「士」的知識階層，他們可以閱讀識字，也掌握知識和思想。但是讀書寫字，只滿足了士的最低門檻，此外還須實踐社會責任。余英時指出：「秦漢統一帝國以後，在比較安定的時期，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的維持都落在『士』的身上；在比較黑暗或混亂的時期，『士』

也往往負起政治批評或社會批評的任務。」<sup>1</sup> 此言揭示士具備社會與政治方面的責任，需要在治世或亂世時維持秩序、針砭時局。在中國漫長的發展過程中，儘管取士的方式有所改變（如漢代舉孝廉、隋代開始的科舉），但士的社會責任卻大抵不變。直到光緒三十一年（1905），清朝廢除科舉制度，士階層逐漸消亡，但掌握知識的人依然存在，只不過性質轉變，從傳統經學私塾教育，轉向為現代西式學制。雖然社會經過政體變革，但由於社會結構變化不大，故社會仍然用著傳統士大夫的標準期許新一代知識分子，余英時所謂：「中國社會仍然尊重知識份子如故，而知識份子也保存了濃厚的士大夫意識。」<sup>2</sup> 又如許紀霖言：「強烈的精英主義道德意識是五四這代知識分子的精神特徵。而五四知識分子對民主和科學的獨特理解也強化了他們的士大夫精英意識。」<sup>3</sup> 因此我們可以如下理解：士大夫意識的殘留，使得五四以後的知識分子，仍會期許對社會政治產生作用。

臺靜農父親臺兆基是清末秀才，臺靜農幼年也受過傳統私塾教育，1922年進入北大國學門，正式接受現代大學教育，屬於新舊交替之間的知識階層，也正因處於新舊之際，使他在歷史動盪之際不斷探問「知識分子」還有何作用。

臺靜農渡海前的小說寫作，如《建塔者》（1930）與《亡明講史》（約成稿於1940年前後）。<sup>4</sup> 臺靜農一直有個或顯或隱的論述主題——「知識分子／文人的景況」，例如：《建塔者》的敘事者多是受過現代教育、具備知識的青年，而他站在知識分子的角度，敘述身邊的革命者（文中稱呼為「建塔者」）與軍閥鷹犬的

<sup>1</sup> 余英時：〈中國知識份子的邊緣化〉，《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總第15期（2003年6月）。連結：<https://www.cuhk.edu.hk/ics/21c/media/online/9100057.pdf>

<sup>2</sup> 余英時：〈中國知識份子的邊緣化〉。

<sup>3</sup> 許紀霖：〈「少數人的責任」——知識分子的士大夫意識〉，收入《左衝右突——現代政治激流中的中國知識分子》（香港：香港城市大學，2021年），頁201。

<sup>4</sup> 儘管該書實際出版年份為2020年，但從臺大館藏現存手稿資料顯示，該書的寫作是在臺靜農避居四川，任職於國立編譯館時著手，書名始標為「晚明講史」，後改為「亡明講史」。

周旋、抗衡。敘事者描述建塔者們流血犧牲、以血鑄塔的姿態時，時常流露出一種若隱若現的失落感。這種失落，我認為是出於「身在革命氛圍之中，卻無法實際參與」的徬徨躊躇，樂衡軍以「頹廢知識分子」形容之。<sup>5</sup> 樂衡軍挖掘出此一頹廢青年的形象後，我想進一步探討：為何臺靜農筆下頹廢知識分子的存在如此顯眼，甚至成為臺靜農創作中屢屢出現的主題？接著進一步提問：臺靜農使用頹廢知識分子的形象，傳達了什麼訊息？最後，我們要問的是：臺靜農身處民國初期的北京，面臨張作霖（1875-1928）積極討赤的壓迫、不容自由發聲的黑暗時代，作為知識分子的臺靜農是否把自己投射其中？在期待光明的時刻，他自認扮演的角色是旁觀知識青年，還是流血建塔者？本文將從《建塔者》中找尋線索。

本文第二節，關注焦點為三〇年代白沙時期，這段時期臺靜農留下的文字包含《白沙讀史劄記》、《亡明講史》，革命激情已然退去，進入全面對日抗戰，此時臺靜農關注的不再是革命與建塔，而是將目光轉向歷史書寫，尤其關注晚明進入清朝此一時期。正值國家動盪，南明、李自成（1606-1645）、清軍三方角逐之際，「仕」與「隱」驟然成為朝堂士大夫必須思考的問題。從《亡明講史》中，我們看到明亡前夕，宮中的朝臣仍在謀求個人榮華，鋪設康莊仕途。迫得崇禎皇帝（1611-1644）只能哀嘆：「朕倒不是亡國之君，你們才是亡國之臣呢！」<sup>6</sup>對於掌握為官之道，而在新朝依然平步青雲者如錢謙益（1562-1664），臺靜農

<sup>5</sup> 「故事中人從旁目睹著某一個激進的青年，為理想（就是『革命』事業）如何冒險捐軀，義無反顧地犧牲了，這就返照回來，使這旁觀的角色——往往以第一人稱『我』為敘述身分——倍感自己的怯懦無為，甚至抑鬱頹廢；但這頹廢的背後卻深埋著熾烈的憤懣……」樂衡軍：〈悲心與憤心——談臺靜農先生兩本小說集中生命情懷〉，收入《意志與命運：中國古典小說世界觀綜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1年），頁406-407。

<sup>6</sup> 臺靜農著、廖肇亨校注：《亡明講史》（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20年），頁10。本文所引小說文字皆出於此版本，下文不再一一標註，僅隨文附上頁數。

發出尖銳嘲笑：「難怪他會作詩。」(頁 155)從明朝唱罷，滿清登場的歷史過場，我們看見臺靜農描繪出一幅亡國前的知識分子群像，朝堂裡的袞袞諸公鑽營著生計，謀求新朝官位。而真正為本朝憂憤的人，上至崇禎、史可法(1602-1645)，下至無名乞丐，則先後殉國赴死。我們可以如何理解臺靜農何以點出變節臣子「詩人、文人」的身分呢？寫詩何以成為變節的原因？從這些文人的失德之中，能否折射出臺靜農對於知識與文化的期待？這將是本節希望探討的論題。

近年來，臺靜農小說研究漸趨完整，賴柏霖的博士論文《臺靜農先生小說研究》嘗試綜觀其小說生涯，把臺靜農小說分為呈現型鄉土小說、見證型革命小說、講史新變三階段，從「見證——講史」文體轉變闡析其創作歷程，並強調文本與作者生命行動互為指涉，其分析多集中於歷史背景與小說創作的關係。<sup>7</sup>之後，許霖的〈欲振翅的海燕：臺靜農來臺前的思想取徑與主體鍛造〉與博士論文《鶴唳猶傳建塔心：臺靜農的文學與思想》，將小說、詩、雜文、教育實踐全景式並列，呈現「知識人——革命人」合一的歷史心態演變，對臺靜農一生思想與創作做出整體性整理，從「建塔者精神」解讀臺靜農的廣義革命理想。<sup>8</sup>我希望在兩文的基礎上，深入到臺靜農小說內部，以「焦慮」作為關鍵字，探討臺靜農同時身為知識分子／文人所流露出的焦慮及其轉向，挖掘出一條隱伏在其前半生寫作的草蛇灰線。

<sup>7</sup> 賴柏霖：《臺靜農先生小說研究》（臺北：世新大學人文社會學院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9年）。

<sup>8</sup> 許霖：《鶴唳猶傳建塔心：臺靜農的文學與思想》（新竹：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論文，2023年）。

## 二、關著弄文學的人——頹廢無力的知識青年

由於創辦未名社半月刊的緣故，臺靜農於 1928 年前後頻繁寫作、發表短篇小說，先後集結出版《地之子》、《建塔者》，兩書皆由北京未名社發行，後者收錄十篇短篇小說，寫作的意旨揭示在書名本身，「建塔者」意涵來自「流血建塔」的信念：「你知道，我們塔的基礎，不是建築在泥土和頑石的上面；我們的血凝結成的鮮紅的血塊，便是我們的塔的基礎。」<sup>9</sup> 這裡流血建成的塔，指的是光明的新時代，借用其中一篇〈歷史的病輪〉中的對白，可以稍微勾勒出何謂「塔」：「在新時代的前夜，時時刻刻有人在黑暗中犧牲的。我們現在希望的光明，正是恆河沙數的青年的血染就的。」（頁 130）此種呼號是整本《建塔者》中的主旋律，不時在書中各處看到呼喚著光明未來的情節。<sup>10</sup> 但本書一直不曾明言的問題是：本書中的建塔者們，他們期待的光明未來究竟為何？而建塔者們前仆後繼奔赴的事業又是為何？也許限於時代與環境，<sup>11</sup> 導致臺靜農沒有進一步解釋，

<sup>9</sup> 臺靜農：《建塔者》（新北：遠景出版社，1990 年），頁 83。本文引用小說段落皆以此本為主，以下引文將會隨文標記頁數，不再獨立註解。

<sup>10</sup> 類似的情節有以下數例：（1）「死又算什麼？冰等自然不會幸免的，要知道時代沒有屬於我們以前，我們的血一點也不能愛惜的。」（臺靜農：〈昨夜〉，《建塔者》，頁 91）；（2）「你該相信，渺小的我，早已經交給了我們偉大的工作了。然而現在，我當更充實了我的力量，為了我們崇高的人群的塔，為了我所崇敬的你！」（臺靜農：〈鐵窗外〉，《建塔者》，頁 145）；（3）「海南革命的火焰正在光芒四射的時候，中原的革命正在觸機待發的時候，他忠誠地做了一個英勇的戰士。他以骯髒的腳步，邁進新的時代；他以泥土的手，創造全人類的新的生活。」（臺靜農：〈井〉，《建塔者》，頁 190）。

<sup>11</sup> 1928 年的北京時由奉系軍閥張作霖主政，而張作霖在他政治生涯的後期堅決反對赤化，因此大力打擊共產黨地下活動，包含北京十八烈士事件，此次事件對於臺靜農本人衝擊甚大，《建塔者》中亦有不少情節與十八烈士事件隱隱相合，詳見柳冬嫻：〈革命發生時的革命文學——臺靜農《建塔者》及其它〉與 1927 年的北京革命〉，《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2 年 4 期，頁 47-65。

致使整本書的激情呼喊而沒有堅實的動機支撐。不過我們仍可從書中一些情節中探索。

### （一）《建塔者》中的知識青年

〈井〉是本書最後一篇小說，也是篇幅最長的一篇，敘述一名青年成長過程，經歷父親為了給地主掘井卻遭意外活埋、哥哥付不起田租而上吊自縊，眼見身邊至親因窮困亡故，而有錢的富人則端居豪宅、享受安樂，迫使青年開始思考貧富不均、命運與階級的問題，並且得出結論：資產者若失去了無產者的勞動，便無法存在，農民工人等無產者是撥動人類進化齒輪的勞動力，但成果卻被有產者剝奪。以上的結論，成為了青年投身革命的契機。小說的最後，提及革命正在蠢蠢欲動，「海南革命的火焰正在光芒四射的時候，中原的革命正在觸機待發的時候，他忠誠地做了一個英勇的戰士。」<sup>12</sup>

此處所謂海南的革命，若以臺靜農執筆寫作的 1928 年去對照當時海南發生的革命，應是指當時中國共產黨 1927 至 1928 年於海南進行的土地革命。<sup>13</sup> 有了此一歷史背景，加上青年對於階級的思考，可知此處革命具有共產主義背景，因此我們可以說〈井〉這篇小說，是描繪一位青年共產黨員的出現。

但不只是〈井〉，本書中吶喊建塔革命口號的人皆是左翼知識青年。知識青年為何會走向革命？我們可以參考楊儒賓的意見，他在一文中提到五四文學以「人的文學」為核心，強調個體獨立精神。但過於強調個性解放、獨立精神與衝破網羅，缺乏穩固的人格基礎以及與歷史共感的連結，因而顯得單薄蒼白。這使得個人主義文學的力量難以應對當時激烈的社會矛盾。故個人主義文學在二〇年代後期逐漸被階級性、集體性的馬克思主義文學取代，由「個人主義」的文藝

<sup>12</sup> 臺靜農：〈井〉，收入《地之子建塔者》（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頁202。

<sup>13</sup> 關於海南的革命，詳參李德芳編：《瓊崖革命簡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

路線轉向「階級人性」的文藝路線，形成革命文學，<sup>14</sup> 席捲二〇年代後期的文壇。值得注意的是，楊儒賓指出舊文人和左派文人之間的共性：「舊文人習氣又易招惹強烈表現型態的浪漫主義，他的頹廢文人的精神表現可以藉此獲得理解的話，那麼，相反地，我們很訝異地發現，當時的左派文人也有類似的精神氣質。」<sup>15</sup> 此種頹廢的精神表現，同樣也屢屢出現在《建塔者》中，且待下文的論述。

回到〈井〉這篇小說，我們能否藉此得知《建塔者》中的革命青年們都在為實現階級性、集體性的馬克思主義而努力呢？如果回到當時臺靜農所處的 1928 年北京，時由奉系軍閥張作霖執政，此時奉系軍閥正積極討赤反共，以尋求列強支持。<sup>16</sup> 依照柳冬嫻的考證，張作霖於 1927 年處決的李大釗、吳可、顏蔚蒲等人，便帶給了臺靜農極大的衝擊，催生了《建塔者》一書的誕生。<sup>17</sup>

《建塔者》一書中，我們看見了青年奔赴革命，流血建塔，同時也往往有位敘事者以「我」的身分，在旁紀錄下這場黎明到來前的黑暗，如賴柏霖所言：「創作革命文學的首要意義，應該是『見證』一幕幕的時代悲劇與崇高人格。」<sup>18</sup> 樂蘅軍總結這類人時，指出此一旁觀角色身分多為知識分子，因為目睹身旁的人親臨革命現場，甚至赴死的過程，從而返照出自身的怯懦無為、抑鬱頹廢。<sup>19</sup> 以

<sup>14</sup> 楊儒賓：〈革命文學的興起：個性與階級性的消長〉，《中國文哲研究通訊》29 卷 4 期（2019 年 12 月），頁 197-222。

<sup>15</sup> 同上註。

<sup>16</sup> Gavan · McCormack：《張作霖傳》（湖南：中南出版集團，2014 年），頁 261。

<sup>17</sup> 「『十八烈士』中，有不少人是臺靜農的朋友，在那樣一個血雨腥風的時刻，臺靜農沒有苟安緘默，最早採用小說的形式為他們建築了一座精神的紀念塔。《建塔者及其它》的主題和風格，很大程度上與『十八烈士』有直接的關係。王敬臣、劉惕莊、顏蔚圃、吳可等烈士，被臺靜農直接寫進了小說……。」柳冬嫻：〈革命發生時的革命文學——臺靜農《建塔者及其它》與 1927 年的北京革命〉，頁 48。

<sup>18</sup> 賴柏霖：《臺靜農先生小說研究》，頁 77。

<sup>19</sup> 樂蘅軍：〈悲心與憤心——談臺靜農先生兩本小說集中生命情懷〉，頁 406-407。

下我們將統稱這類旁觀者為知識青年。以下略舉幾例，方便我們具體描繪知識青年的輪廓。

## （二）知識分子的頹廢無力

〈建塔者〉是《建塔者》一書的首篇同名小說，本篇特別之處在於敘事者的身分是革命青年，對著知識青年的「你」敘述一段因革命而受難的故事。大旨為敘事者和另外三名青年一同被軍閥捕獲，囚禁牢獄，某一晚，三名青年和另外幾位囚犯被押解法場執行槍決，臨刑之際，幾名青年高聲唱起歌、高呼著萬歲，最終在荒野中就義，敘事者「我」成為倖存者，活了下來，悲憤慷慨地對知識青年「你」訴說著這段富於浪漫色彩的行刑過程，同時仍對建塔抱有崇高的嚮往。

值得注意的是，敘事者的口吻並非平鋪直敘對著讀者說話，而是對著一位有特定形象的「你」應答。讀者雖無法具體得知「你」說了些什麼，但從敘事者的口吻中，可以感知對方應該是從事文學的知識分子，例如以下數句：

你不是說，不知我下落時，你非常地焦慮麼？其實失了蹤跡的事，我們早已習慣了，**你們關著弄文學的人**，哪裏知道呢？當你東奔西跑打聽我的消息的時光，我正同我的朋友被一群野獸看守著……。（頁 83-84，粗體為筆者所加）

你以為這是無用的犧牲麼？不，你還是不能了解我們，這難怪你，**你的環境與你的太好了；你必須到人間裏看一看**，你便可以發現你所親愛的人們，是怎樣地被強暴欺凌？是怎樣的痛苦與淒苦。（頁 84，粗體為筆者所加）

從上兩句話中，作者引導讀者想像「你」的反應，從敘事者的口吻描繪出輕蔑鄙夷的態度，把對方定調為「關著弄文學的人」，並沒有實際參與革命，也不了解

革命的本質便是流血犧牲。帶著傲氣嘲弄的語氣，展示親臨革命時的所見所聞，鋪陳革命前線流血、壓迫的故事，享受著「你」聽聞後驚悚無知，甚至是崇拜嚮往的神情。從此段對話中，儘管對方的聲音始終缺席，他的反應、態度，卻浮現在讀者的想像中，促成這場對話持續發聲。再者，即是「你不是說，不知我下落時，你非常地焦慮麼？」這一句，明顯切割出建塔革命者與知識青年之間的差異，讀者可以合理推測兩人應是交情匪淺的好友，當革命者因被逮捕而失蹤時，知識青年正焦慮打聽、東奔西跑，反襯出兩人之間的主動、被動關係。一位身居革命前線，因事被抓，此時蟄伏於軍閥的牢獄之中，態度依然慷慨昂揚。另外一位遠離革命，此時只能感受焦慮與打聽下落。其中，知識青年顯然是時時處於被動、無能的姿態。

如果說〈建塔者〉是親臨前線的革命者對知識青年的敘述，那麼〈昨夜〉便是革命者與知識青年間具體的互動過程。〈昨夜〉大旨上述說革命者「秋」因事機敗露而倉皇逃難，知識青年從旁協助，將革命者送上返回家鄉的船，並且記錄下兩人之間的對話。閱讀前後兩篇小說，應會發現兩篇故事彼此呼應，同樣是劫後餘生的革命者和知識青年的互動，惟差別在於這次敘述者成為了知識青年，從旁紀錄下革命者的言行舉止，從這篇小說中，我們更清楚洞悉知識青年作為旁觀者，卻又緊臨著革命，與革命保持若即若離的關係，但這層關係已足夠使知識青年激起憤心，<sup>20</sup> 但又無法抑止從內心深處散發出來的悲觀。略舉以下情節為例：

「怎麼樣，今夜比昨夜好罷？」我笑著問。

「好是好的，不過昨夜也沒有什麼；反正這個時代，不是我們安樂的日

<sup>20</sup> 關於臺靜農小說中的情懷，樂蘅軍曾用悲心與憤心概括，而《建塔者》的寫作即出於憤心。樂蘅軍：〈悲心與憤心——談臺靜農先生兩本小說集中生命情懷〉，頁 406-407。

子。」「倉促地離開了這古老的都城，不免有些留戀吧？」

「自然是留戀的，尤其是獄中人，冰是那樣的瘦弱。」

「只要不死，……」

「死又算什麼？冰等自然不會幸免的，要知道時代沒有屬於我們以前，我們的血一點也不能愛惜的。」秋接著決然地說。（頁 90-91）

從上述段落中，再度顯現革命者對於死的覺悟，此處革命者將死生置之度外，把目標放在建設未來；知識青年關心今夜與昨夜的差異、獄中人的生機，顯示知識青年並未如同秋一般做好赴死的覺悟，不同於革命者將希望放在美好未來，知識青年更關心著此時此刻及身邊的人。

又如：直到兩人臨分手之際，出現這樣一段對話：

「希望我們再見時，能夠比現在好。」

「時代麼？」我問。

「自然囉！」秋自信地說。

「未必罷，恐怕終於是希望了。」我微微嘆息著說。

「怎麼，你又在彈你的舊調子？」秋陰森地笑了。「這個時代，還容許我們悲嘆嗎？」

我慚愧地笑了。我們仍舊緊緊地握著手。舟子忙著收錨，我們撒手別了。

（頁 98）

兩人的對話再度凸顯知識分子與革命者的隔閡。並未親臨革命的知識分子對時代抱持悲觀，革命者秋儘管親眼見證同胞被軍閥攫去，甚至毀滅，卻依然能對時代抱持樂觀，相信未來將屬於自己，相反地，也可能是知識分子對此時此刻抱持悲觀，因此並未實際參與革命，因為他看不見光明未來。而秋洋溢著樂觀，可以暫時放下同伴的犧牲，將死傷轉化成建塔的希望。

除了兩種形象的差異外，本篇故事由知識青年的角度敘寫，增添許多對於情景、心緒的描繪，更加渲染革命前夜的黑暗氛圍。

我們走出站在欄杆旁，這時明月掛在中天，海水微波，月光碎亂在波心裏發出燦爛的光芒。遠看停船無數，都無燈火。左岸是 T 埠的大樹林，林中聳出一座高塔。烏鴉在林中哀哀的叫，但不見飛翔。(頁 90)

此段情景的描寫，固然可以當成一段小說過場，讓小說節奏變得緩和。但如果注意到這段情景的細節，可以捕捉更多關於知識青年的內心流動。例如「都無燈火」、烏鴉「哀哀」的叫、但不見飛翔。或多或少都帶領讀者，走向夜的深處，使畫面充滿了黯淡、停滯，此段描繪是藉由知識青年的眼中捕捉，不妨視之為對於革命前景的低徊心緒。

也可以注意到，〈昨夜〉中的情節，一部分是在敘事者的回想中進行的，例如：秋獨自在夜中深山中遁逃的一節，以及秋換上華貴衣服，扮作公子哥模樣，在火車上談笑風生一節，皆在於敘事者回想之中完成。耐人尋味的是敘事者的反應：為何每當敘事者回想完秋的事蹟之後，一則變得不快，一則強調著孤獨呢？如：「我迷離地想了一大遍，心中總覺不快」、「現在我孤獨地夾在人群中，誰也不會認識我是昨夜頭等車中的貴人。」因為，敘事者身為知識青年，身邊圍繞著一群革命者。敘事者旁觀身邊好友紛紛共赴革命，甚者下獄、毀滅，而敘事者卻袖手旁觀、獨善其身，這件事隱隱讓敘事者湧起倖存者的怯懦、自卑情緒，使得他回想起秋獨自靠著機智反應擺脫鷹犬、意氣昂揚的樣子，加上敘事者眼中的秋在本篇中多次發笑，無論是逃離鷹犬後的冷笑、大笑、失笑、滑稽地笑、訕笑，或是嘲笑敘事者懦弱時「陰森地笑」，一再呈現出革命者的樂觀、颯爽，激化了敘事者僅僅作為陪伴者怯懦無為、頹廢抑鬱的心緒，使得他每逢想起秋的歷程時，總感到不快與孤獨。

看完上述〈建塔者〉、〈昨夜〉的例子，最後可以再簡單觀察〈歷史的病輪〉這一篇，該篇的情節同樣由身為知識青年的旁觀者敘說，描述革命青年曼喬積極參與群眾運動，有效煽動群眾情緒，到後來被押解法場、殺身成仁的過程。該篇的敘事者時常湧起慚愧、懦弱的情緒，正如他自己所言：

想到這裏，我非常的慚愧，我們同是一樣的青年，又同處在一樣黑暗的重壓之下，可是我們的心情和行為，居然劃成了兩個時代。唉我的怯懦、頹喪，將毀滅於黑暗的重壓之下了。(頁 123)

敘事者是還在上課的學生，但同樣身為青年，比他年幼，且被他稱呼為「喬妹」的革命青年此時積極投入群眾之間，為了革命理想燃燒自身，最後事敗身死，敘事者依然相信她已然成為「晨曦的使者」(頁 130)，而徘徊在墳塋前的敘事者，頓覺自身除了尚且苟活以外一無所有，對於喬妹的死亡既悲憤且無奈。

面對身旁革命友人犧牲，卻感到無能懦弱的心緒，此一情感時時縈繞在《建塔者》全書中，成為本書慷慨激昂的呼號詠嘆下，另一絲低靡徘徊的喃喃自語。值得注意的是，《建塔者》中出現的革命青年，亦不乏出身自知識階級、受現代教育者，如〈昨夜〉秋是精通法文的學生、〈死室的彗星〉逸生是醫科大學學生、〈歷史的病輪〉曼喬是滿房間都是書的大學生，或許正是因為同樣是知識青年，卻選擇實踐革命，使得《建塔者》全書中的負罪感更加深沉：

距離柏樹不多遠的六座新墳，不用說，這是六個青年埋葬的地方了。我走到跟前，往復地徘徊著，我慚愧自我的懦弱，我沉痛於良友的毀滅。我用什麼野祭呢，所有的僅是這一顆憤激的心。(頁 133)

「徘徊於墓地」或「遙想行刑當下」這兩種行為，對於臺靜農而言有特別的意義，類似情節也出現在同書〈死室的彗星〉、〈人屍〉等篇章中，為何臺靜農對

於行刑或墓地如此感興趣，進而著力描寫呢？表面上看來，描寫行刑當下，作者表現出建塔者以肉身面對子彈，以青春直面死亡的壯烈；而徘徊於墓地，則是知識青年最後能為建塔者做的唯一一件事。也有論者考證出法場的真實地點，指出北京十八烈士事件對於臺靜農的衝擊，<sup>21</sup> 但不妨參看臺靜農為全書寫的後記：

本書所寫的人物，多半是這些時代的先知們。然而我的筆深覺貧乏，我未曾觸著那艱難地往各各得上十字架的靈魂深處，我的心苦痛著。**其實一個徘徊於墳墓荒墟而帶著感傷的作者**，有什麼力量以文筆來渲染時代的光呢？（頁 191，粗體為筆者所加）。

誠如臺靜農所言，他是徘徊於墳墓荒墟的人，他並不是先知，也非自己筆下的建塔者，他對於建塔者的流血毀滅既感到無能為力，又自感無法用筆真正紀錄下已經就義的建塔英烈，因此筆調總帶著憂傷怯懦。由此簡短的自白中，我們便不難理解為何作者時有親臨墳場的情節，因為他自覺是從革命前緣中倖存下來的人。因此當我們閱讀到《建塔者》中，人物時常慷慨揚言、奔赴光明未來時，亦不宜忘記那些建塔者就義後的墳場，墳上的弔唁者其實才是臺靜農自身的投射——一名頹廢抑鬱的知識青年。

透過《建塔者》的後記，我們得知臺靜農的自我投射其實是知識青年，而非流血革命的建塔者，作者透過此一安排，表現了敘事者對於自身身分的焦慮，在書中這類旁觀者的角色多被賦予「學生、弄文學的」身分或形象，而革命氛圍越熾烈、死傷越重，旁觀者越是感到憂憤、無力。若我們細究為何臺靜農筆下的敘事者時時散發此一焦慮，或許可以試圖從一段故事中理解：

---

<sup>21</sup> 柳冬嫻：〈革命發生時的革命文學——臺靜農《建塔者及其它》與 1927 年的北京革命〉，頁 47-65。

靜農在 1925~1927 年期間，曾十分積極地參加示威遊行等各種革命活動，還一度加入了組織……後來，有一次組織讓靜農晚上去散發傳單，靜農「害怕」沒有去，從此也就脫離了組織。<sup>22</sup>

這段引文出自王冶秋的傳記，<sup>23</sup> 說明臺靜農曾經也親身投入過革命組織，但因為「害怕」而逃離實際行動，甚至離開革命，使得他成為革命氛圍下的旁觀者甚至是倖存者。或許我們便不難理解，臺靜農筆下的知識分子憂憤焦慮卻無所作為，卻屢屢出現在小說中，正如許霖所言：「客觀地反映臺靜農這類原本的『文學青年』、當時的『革命青年』某種普遍的心理狀態和困惑」。<sup>24</sup>

《建塔者》寫作時間集中於 1928 年，大抵可以分為前後期，一到三月臺靜農發表了〈建塔者〉、〈昨夜〉、〈春夜的幽靈〉，這幾篇敘事者具有明顯的旁觀性質。四月初臺靜農因未名社出版的《革命與文學》，遭北洋軍閥拘捕軟禁五十天，出獄後，同年八月繼續寫作餘下篇章，小說內文增加了入獄的經驗，例如：〈死室的彗星〉中「依照獄中的規矩一齊壓著右膀子睡了」，<sup>25</sup> 或是〈鐵窗外〉對獄中人的心境有著比較細節的刻劃，<sup>26</sup> 但沒有改變的是臺靜農的知識分子性格依舊濃厚，即使入獄一事也使他成為某種意義上的建塔者。<sup>27</sup> 發表〈被飢餓燃燒的人們〉後，臺靜農便暫停寫作小說，經過一年多的擱筆，一九三〇年三月發表〈一九三〇年試筆〉時言及：

<sup>22</sup> 王可：《王冶秋傳》（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年），頁 81。

<sup>23</sup> 經過柳冬嫵考證，王冶秋即是〈建塔者〉、〈昨夜〉中，革命者「秋」的原型人物。柳冬嫵：〈革命發生時的革命文學——臺靜農《建塔者及其它》與 1927 年的北京革命〉，頁 48。

<sup>24</sup> 許霖：《鶴唳猶傳建塔心：臺靜農的文學與思想》，頁 45。

<sup>25</sup> 臺靜農：《地之子建塔者》，頁 137。

<sup>26</sup> 臺靜農：《地之子建塔者》，頁 168-172。

<sup>27</sup> 為何入獄經驗沒有使臺靜農就此擱筆不寫，筆者臆測跟 1928 年 6 月 4 日張作霖逝世有關，或許張作霖的死使得臺靜農又有了重新寫作的勇氣或慾望。

但是偶一想到並世師友們，往者呻吟於鞭撻鼎鑊之下，今猶飢鷹似的矯首於蒼茫的天宇，向著生的原野騁馳；我呢依舊深藏在無生的殼中，這不令人無端的感到不安麼？<sup>28</sup>

明確地表現出倖存者的內疚，由此可以看出，臺靜農對於創作小說紀錄苦難，並不熱衷，且帶有慚愧，正如魯迅的評價：「臺靜農是先不想到寫小說，後不願意寫小說的人。」<sup>29</sup> 我們或許可以換個說法，臺靜農是欣羨同情著建塔者，卻又無法成為真正建塔者的人。余英時〈中國知識分子的創世紀〉列出的知識分子的特徵：「這個階層常自覺有一種罪惡感，因此認為國家之事以及上述問題的解決，都是他們的個人責任。」且「他們深信社會現狀不合理，應當加以改變。」<sup>30</sup> 可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劇也源於此種罪惡感，因為臺靜農等一輩讀書人儘管具備知識與較為進步的思想，可是卻缺乏與執政者相抗衡的形式、組織，使他們往往經不起政治權威的巨大壓力，使得他們只得向內自疑與自罪，成為焦慮憂憤的讀書人。

### 三、難怪他會作詩——亡明前夕的變節文人

觀察完《建塔者》，我們對臺靜農身為知識分子的焦慮有了初步認識，我們看到一位心繫國家的青年志士身處黑暗時代，如何周旋在革命的前沿，曾經一度成為建塔者，卻又立即退居書桌前，帶著憂傷，用文字為流血犧牲的建塔者招魂。有位當時的文藝評論家如此評價道：「這位作者在他的十個短篇中所給我們

<sup>28</sup> 臺靜農：〈一九三〇年試筆〉，收入臺靜農著，陳子善、秦賢次編：《靜農佚文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2018年），頁148。

<sup>29</sup> 魯迅：《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3年），頁16。

<sup>30</sup> 余英時：〈中國知識分子的創世紀〉，收入《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臺北：允晨文化，2011年），頁87-104。

的，只是關於一些事件的輪廓的描寫，彷彿使我們覺得這位作者對於他所取的事件和人物，雖是具有熱烈的同情與致慕，而他並不能走進這些事件和人物的深處。」<sup>31</sup> 此話誠然，此時臺靜農還苦於身為知識分子卻無力做出實際行動的鬱悶之中。直到對日抗戰期間，期間偶有些小說創作，例如〈電報〉一文，但終究沒有收集成冊，要等到多年以後的《亡明講史》，才能看到臺靜農較為有規模的寫作。該書的成書緣由，編者廖肇亨已經詳述，<sup>32</sup> 本文重點在於觀察臺靜農從憂傷憤懣的知識分子，轉變為具有史識與詩心的學者，他以辛辣嘲弄的筆調，描繪晚明期間的知識分子，並且將以「詩」作為切入角度，觀察「作詩」本屬於創作、社交活動，為何對於臺靜農而言，卻成為知識分子變節的原因，更進一步扣問：「文」此一特性，如何化成、體現在知識分子身上，成為他們「文」過飾非或堅持信念的依據。需要特別說明，以下將以「文人」稱呼知識分子，是為了強調知識分子除了掌握知識之外，還身兼「文」的多重特性。<sup>33</sup>

<sup>31</sup> 韓侍桁：〈文藝短評：建塔者〉，《文學生活》第1期（1931年3月），頁1-4。

<sup>32</sup> 廖肇亨：〈希望·絕望·虛妄——試論臺靜農《亡明講史》與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的人物圖像與文化詮釋〉，《明代研究》第11期（2008年12月），頁95-118；〈「只有漆黑」——《亡明講史》及其相關問題〉，收入臺靜農著、廖肇亨校注：《亡明講史》（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20年），頁xxv-liv。

<sup>33</sup> 文的特性多重豐富，劉若愚整理出文的多重意義：記號——樣式——文飾——文化——學問——著作——文學，而宇文所安認為，「文」的意義多重，起初是圖式，但也可以是文學或者書寫，也可以是「受教化」的，受過「文」教化的文士，將會呈現出「文」的多重面向：透過教育而臻於完善，他可以在政府中擔任文職，擔任該職的能力需經由公開的書寫考試來測驗，他會自然地被文學所吸引。劉若愚著、杜國清譯：《中國文學理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1981年），頁32。〔美〕Stephen Owen, "Omen of the World: Meaning in the Chinese Lyric," (世界的徵象：中國抒情詩的意義) in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 (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5), pp.12-27. 引文出自頁18。

### (一)《亡明講史》中的變節文人

臺靜農於 1938 年為躲避抗戰而進入四川，定居江津白沙，任職教育部國立編譯館，被分派編寫「青年讀物」，於是著手寫作「晚明講史」初稿，其後可能因陳獨秀的意見而未公開發表，<sup>34</sup> 一直到 2020 年方以《亡明講史》為名公開出版，距離當初完稿已經過了八十餘年，如今閱讀，雖偶感文字脫漏，但仍能明顯感覺出臺靜農對於晚明文人的意見。其中最明顯者，即是對於明末朝臣的描繪，全文藉由一位八旬的老總管破題：

魏忠賢作亂的時候，該有多少大臣出頭說話，不怕打，不怕夾，不怕死，真真有骨氣。可是現在呢？國家到了這種地步，那些老爺們，還在鬧什麼黨，東林咧，復社咧，閹黨咧，究竟誰是忠臣，我們也辨不清了。(頁 5)

明末崇禎時期，朝廷陷入激烈黨爭，而闖王李自成、清軍已經環伺在側，但群臣仍兀自吵嚷不休，迫得崇禎皇帝感嘆：「朕倒不是亡國之君，你們才是亡國之臣呢！」(頁 10)在這群臣之中，臺靜農有意營造出滿朝文武庸庸碌碌的群像，用嘲諷詼諧的筆墨，描寫他們靦顏事主的神情，如降臣迎接闖王時頭戴小帽、額貼順字黃紙、披上青衣的模樣，被作者形容為「一群烏鴉似的」(頁 38)。其中，作者較為著力描繪的有幾人，首先是崇禎年間進士周鍾(?-1645)，投降李自成時，被誇讚「文章做得好呀！」(頁 43)並有勸進文，內容包含誇耀李自成「比堯舜而多武功，邁湯武而無慚德。」牛金星(?-1652)在一旁幫腔：「周先生的

<sup>34</sup> 陳獨秀的意見：「修改時望極力使成為歷史而非小說，蓋歷史小說如《列國》、《三國》，雖流傳極廣，實於歷史、小說兩無價值也。」轉引自王德威：〈亡明作為隱喻——臺靜農《亡明講史》〉，收入臺靜農著、廖肇亨校注：《亡明講史》(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20 年)，頁 vii-xxiii。

文章，天下舉子誰沒讀過，真不愧復社的大將，三十年的老名士。」(頁 43) 此處亦大力強調周鍾崇高的文學地位，並與其逢迎諂媚的形象對舉，諷刺意味明顯。

其次為武將劉澤清(1603-1648)，小說內文對他的介紹是：「少年曾學作過八股，考過秀才」(頁 109)、「學作過八股，他好風雅，喜歡作詩」(頁 110) 點明劉澤清擁有文人的背景，但這文人的行為又如何呢？首先是和清軍索要十萬兩黃金，作為投降的條件。再來是奉命剿滅闖賊，但虛與委蛇，無心剿賊，反而索要賞賜，小說中如此形容：「他並不懂得將畧。為人卑鄙貪暴，心計多，膽子小，只知自己，不知國家。」(頁 112) 除了以上人品和軍事上的批評外，臺靜農更從作詩方面有兩處批判：其一是曾有人當面批評他的詩作「雖然好，不作卻更好！」(頁 111) 而遭到劉澤清祕密處決。其二是劉澤清為了嚇唬客人，便當場打死一名囚犯，將腦子心肝取出，混在酒中一飲而盡。顯示其人狼戾乖張。作者不忘點評：「這伯爵，將軍，詩人，原來是人的心肝腦子培養出的呀！然而說起打仗來，……，或者因為他是詩人，心思多，轉變快，不大願意傻子一樣的拼命。所以遇闖賊而潰逃，值清軍則出賣。」(頁 112)

最後是變節文人的代表人物——錢謙益，錢謙益作為明末東林黨魁、文壇領袖，卻變節事清的事跡，此處被臺靜農揀來發揮一番，多次提及錢謙益的作詩才能：「已是六十老翁，臉色焦黑，白髮龍鍾，不能彈，也不能唱，光會作詩」(頁 75)、「這東林黨魁又是詩人的錢老爺卻也沉默起來了」(頁 168)。但這位詩人的行為同時也是文人群像中最奴顏婢膝的一位，臺靜農花大幅筆墨描繪其奔走阮大鍼(1587-1646)、馬士英(1591-1646)之間，參與陰謀、排擠正臣。直到眼見南明將亡，又思考著如何投奔清朝：「他想道，反正明朝天下完了，何必多延長時候？於其多延時日，不如讓我們早些擇主而事罷。」(頁 143) 投奔清朝以後，錢謙益籌備禮物獻給清帥豫王(1614-1649)，而且跪地恭迎清軍入城，

建議豫王「吳下民風柔軟，飛檄可定，無煩用兵。」（頁 155）而豫王認為錢謙益這人「識時務，心機靈活，不是死讀書人，難怪他會作詩，高人一等。」（頁 155）根據小說中對周鍾、劉澤良、錢謙益三人的描述，不難看出臺靜農潛伏在故事表面下的草蛇灰線。《亡明講史》表面上是描述明朝覆亡、李自成、清軍勢力前後登場的歷史怪現狀、刻劃明末群臣的群像，但其做法卻是將靦顏事主的形象與作文章、作詩相提並論，甚至有意把「作詩」賦予心機靈活、反覆無常的負面色彩。正如其臺靜農同時期的《白沙讀史劄記》中所言：「……就是亡了國，秀才也是受優待的，喫虧的還是老百姓。秀才何以這樣得天獨厚！自然是為了讀聖賢書，明白許多大道理，寫得一筆好文字，故能在任何時會都受優待，——自有其身分也。」<sup>35</sup> 此處不免啟人疑竇：為何作詩是一種罪？或是再把問題上升一層：為何讀書人長年浸淫於知識與文化之中，「文」卻在此時失效了？甚至成為文武朝臣變節的動力？

## （二）「文」的失 / 生效

臺靜農在描寫群臣投降闖王時，有一段對白如此寫道：

我們做官的不能沒有官做；做皇帝的自然也少不了臣子，新皇帝是馬上得天下，他左右那里有現成的文武百官？五府六部，事情多得很，少不了我們的。……孔夫子在春秋時候，一車兩馬，跑來跑去，為的還不是做官嗎？後來叔孫通背了秦始皇，帶了學生們穿了短小襖隨著漢高祖，才是儒者的精神呀！什麼叫做「聖之時」，就是認清時會，不要太迂執了！（頁 48）

<sup>35</sup> 臺靜農：〈秀才〉，收入《靜農佚文集》，頁 114。

此處引用了一個典故，出自於《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乃變其服，服短衣，楚制，漢王喜。」<sup>36</sup> 在《史記》中的記載，叔孫通（?-194 B.C.）知時變、深諳君臣之道，懂得迎合主上，即使是違心之論。司馬遷（145-86 B.C.）對於叔孫通的評價是「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sup>37</sup> 此時的明末群臣，皆是深受傳統文化習染的人，面對天崩地裂的時刻，眼前出現兩個選擇，不是抵抗即是順從，但不論是何者，他們都能找到、調用歷史事實為自己此刻行為背書。就降臣來看，孔子（551-479 B.C.）、叔孫通皆成為了他們此刻變節的根據。徐復觀在談論知識分子時，曾經歸結出中國知識分子之所以墮落的原因，尤其指出科舉的危害甚深：

科舉在事勢上只能著眼於文字，文字與一個人的行義名節無關，這便使士大夫和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脫節，使知識分子對文化無真正底責任感；……。科舉考試，都是「投牒自進」，破壞士大夫的廉恥，使士大夫日趨於卑賤，日安於卑賤；把士人與政治的關係，簡化為一單純的利祿之門，把讀書的事情，簡化為一單純的利祿的工具。<sup>38</sup>

儘管明代知識分子變節的原因很多，可能涉及到黨爭、陽明學等各方面政治、思想問題，但從徐復觀的說法，可供我們管窺為何明末有些知識分子不再把國計民生置於首要之務，而是汲營於高官厚祿。而隨後史可法正和內憂外患周旋時，無奈之際，支撐他的卻同樣也是歷史知識，例如援引諸葛亮（181-234）的信念：

<sup>36</sup> 漢·司馬遷著、韓兆琦編著：《史記箋證·劉敬叔孫通列傳》（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5086。

<sup>37</sup> 漢·司馬遷著、韓兆琦編著：《史記箋證·劉敬叔孫通列傳》，頁5101。

<sup>38</sup> 徐復觀：〈中國知識份子的歷史性格及其歷史的命運〉，收入《學術與政治之間》（臺北：台灣學生書局，1985年），頁186-187。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所能逆睹。」(頁 87) 令人奇異的是，諸葛亮的例子同樣被變節臣子光時亨 (1599-1645)、馬士英所援用：

(光時亨) 想到自己先阻止崇禎南遷，後又開門獻城，這於大順皇帝都是大功……於是高高興興的寫了一封家信給兒子們……諸葛兄弟，分事三國……我已受恩大順……仍當勉勵湊 (筆者按，疑為「讀」字) 書，以無負南朝科第。(頁 44)

(馬士英) 主張搬到他的家鄉貴陽，這在他確是一條上策，把朝廷放在自家荷包裏，有如諸葛亮之於阿斗。(頁 143)

前者透過諸葛兄弟分事三國的典故，安頓自己投降闖王的事實。後者則是透過諸葛亮輔佐阿斗 (207-271) 的經驗，考慮將朝廷移至自己家鄉，好把朝廷裝進荷包裡。在忠君與變節的泥淖中，無論選擇為何，他們都能找到一套歷史事實可供各自表述，藉以安頓自己，與其說是「文」在此時失效，不如說文人各自在「文」的支持下，各自找到需要的說法。也如同寫詩一事，於臺靜農筆下，寫詩的人可以是周鍾、劉澤清、錢謙益輩，逢迎拍馬、反覆無常。但不宜忘記，書中也記載了一位會寫詩的乞丐：

有一乞丐在一座橋旁的人家牆上，見了這張安民告示，不覺長嘆一聲，隨著冷笑道，「好個大明忠臣！」忽然拿了一塊煤炭，在橋上題起詩來：  
三百年來養士朝，如何文武盡皆逃？  
綱常留在卑田院，乞丐羞存命一條！  
這乞丐題了詩，身子往橋下一縱，流水無情，立即將他淹沒了！

儘管就從「會寫詩」這點來看，乞丐的原來身分應不是平民，甚至可能是知識階層，但耐人尋味的是：如此忠於明朝的知識人，非但沒有躋身士大夫之列，反而

是流連街頭的乞丐。使得故事的荒謬性再度上升。但也看出一件事，即是臺靜農並非一味貶斥寫詩、做文章的人，我們不只能看見一位會寫詩、忠於明朝的乞丐，同時也看見史可法矢志於抗清，效法著諸葛亮，寫出媲美出師表的上疏。<sup>39</sup> 寫詩做文章並非變節的原因，而是同樣習染著文化知識、詩歌文章的知識階層，擁有同樣的學習背景，卻在天崩地裂時做出不同的選擇。至於寫詩做文章只是他們為了奔赴各自的選擇，此刻所使用的工具。

## （二）臺靜農的詩與史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臺靜農在《亡明講史》時一再指摘錢謙益等詩人，但我們可以注意到一個事實，即是臺靜農寫作《亡明講史》時，同時也開始寫作舊體詩，根據作家舒蕪的回憶，臺靜農居住白沙期間，陸續寫下〈夜起〉、〈山居〉等詩篇，並且和柴德賡、舒蕪等時相唱和。<sup>40</sup> 臺靜農在青年時期，曾經發表一篇〈讀「旁觀者」言〉，極力抨擊舊體詩過度注重格律而貶抑詩歌自然音律的現象，其言：「要知我們所以打破不自然的音律，也就是因為我們好赤立大地，發展天才起見。」<sup>41</sup> 此文發表時為 1921 年，新文化運動正如火如荼提倡白話詩，臺靜農也曾有過〈寶刀〉、〈獄中見落花〉等創作實踐，但如今到了抗戰時期，文學革命時的青年已經退去火氣，重新提起毛筆寫作舊體詩，而新詩卻早已退位。要如何理解曾經的新詩作者卻走向他反對的舊體詩呢？事實上，這樣的現象不只出現在臺靜農一人身上。正如陳平原指出：抗戰八年使學者教授的創作古典詩的熱情突然高漲，因為突如其來的變故使學者們被迫離開書齋，顛沛流離中，

<sup>39</sup> 敘事者對該文的評價為「後人都說可法這篇文章和諸葛亮的〈出師表〉一樣的好，是的，他還想學諸葛亮呢。」臺靜農著、廖肇亨校注：《亡明講史》，頁 87。

<sup>40</sup> 舒蕪：〈憶臺靜農先生〉，收入陳子善編：《回憶臺靜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 年），頁 57。

<sup>41</sup> 臺靜農：〈讀「旁觀者」言〉，《文學旬刊》第 23 期（1921 年 12 月），頁 1。

創作古典詩使其確認文化身分，得以思接千古、表達幽微思緒與不合時宜的感覺，是故吟詠或寫作舊體詩詞是絕佳的精神安慰。<sup>42</sup> 儘管陳平原此處敘述的對象為遷校西南聯大的教授，但臺靜農同為避居深山中的學人教授，或許也能作如此理解。王德威認為此刻臺靜農是「有意識的透過古典詩歌另闢蹊徑，探尋一個可以疏解鬱憤與憂患的管道。」<sup>43</sup> 儘管錢謙益作詩，和臺靜農作詩的目的未必相同，<sup>44</sup> 但我們同樣能看見知識文化於最黑暗時刻的不同體現，錢謙益在降清之後，卻時時譏刺清廷，展現對明朝的懷念，且不使用順治年號，或是表現出對抗清事業的關心。例如：〈二月初四日夜宴述古堂酒罷〉一詩，作於順治逝世後一個月，有論者指出此詩是針對順治駕崩而作，其中展露毫不掩飾的幸災樂禍。至於為何如此，有論者解釋道：「無非是要世人都知道他做了好事，以掩其從前之穢跡而已。」<sup>45</sup> 修辭本該立其誠，但卻成為錢謙益用來「文」過飾非，減輕過往罪責的方法。<sup>46</sup> 而抗日戰爭時的臺靜農，選擇以講史的方法指向當前時局，<sup>47</sup> 或是以錢謙益暗指附日的周作人。<sup>48</sup> 甚至連書法也轉向學習明末殉節

<sup>42</sup> 陳平原：〈豈止詩句記飄蓬——抗戰中西南聯大教授的舊體詩作〉，收入《抗戰烽火中的中國大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225。

<sup>43</sup> 王德威：〈亡明作為隱喻——臺靜農《亡明講史》〉，臺靜農著、廖肇亨校注：《亡明講史》，頁xix。

<sup>44</sup> 關於臺靜農與其舊體詩，已有論者以《白沙草》、《龍坡草》為例詳論，指出白沙時期的詩歌展現出知識分子面對家國喪亂的大我關懷。詳見賴佩暄：〈論臺靜農舊體詩中的情志、心境轉折與私人寫作：以《白沙草》、《龍坡草》為例〉《東華漢學》第22期（2015年12月），頁155-207。

<sup>45</sup> 張仲謀：《懺悔與自贖：貳臣人格》（北京：東方出版社，2009年），頁125-126。

<sup>46</sup> 此處的思考來自於梅家玲教授於課堂上的啟發，在此註明。

<sup>47</sup> 《亡明講史》中，臺靜農曾借題發揮，用以指摘日軍在中國的行為：「正如三百年後現在的日本兵的獸行一樣，……，讀者自己去翻翻這篇血史罷，看看同我們的日本敵人現在放下的血債有什麼分別沒有？」臺靜農著、廖肇亨校注：《亡明講史》，頁141。

<sup>48</sup> 臺靜農曾明確將周作人比擬為錢謙益：「知堂老人不是說過麼？『中國是我的本國，是我歌於斯哭於斯的地方……』」（見瓜豆集：自己的文章）一旦歌哭無地，忽爾轉臉陪人喜笑，文人的史例，只有錢牧齋一流人物作此態耳。」詳參臺靜農：〈「謝本師」周作人：老人的胡鬧〉，《抗戰文藝》第7卷第6期（1942年6月），頁404-406。

的倪元璐(1593-1644),<sup>49</sup> 我們可以說種種傳統文化, 諸如讀史劄記、講史、舊體詩、書法此時匯聚成為一股洪流, 成為臺靜農關懷現世, 以知識分子姿態參與國家的方式。亦如許霖認為, 此時的臺靜農已經突破《建塔者》時期「欲為革命人而不得」的桎梏, 以文史作為連結文學實踐與社會實踐的方式。<sup>50</sup> 由此, 我們不妨將以上現象視為「文」的多重意義展現, 從「記號——樣式——文飾——文化——學問——著作——文學」的光譜中, 文可以是文學創作, 尤其是詩歌作文, 但也可以是文飾, 無論這個文飾是字面上的紋彩修飾, 還是引伸而來的掩飾, 都是「文」的多重體現, 因此我們能看到晚明文人同樣具備知識, 精通詩文寫作, 但卻有忠奸之別, 無論選擇為何, 他們都能在「文化」中, 找到賴以生存的寄託, 因此我們看見諸葛亮的事跡竟能使史可法鞠躬盡瘁, 也能使光時亨、馬士英貪圖榮利、賣國求榮。

#### 四、結語

本文透過閱讀臺靜農《建塔者》、《亡明講史》, 探討其渡海前的知識分子焦慮, 並揭示這種焦慮所包含的複雜深層的面向。《建塔者》中, 臺靜農以旁觀者的視角書寫革命, 描繪出一種頹廢無力的知識青年形象。他們對革命者的勇氣既仰慕又自愧, 對時代的黑暗既憤怒又無奈, 這種張力成為作品的核心情感基調。而臺靜農在《亡明講史》中, 則轉向歷史書寫, 以辛辣嘲諷的筆觸刻畫晚明

<sup>49</sup> 王德威：〈國家不幸書家幸——臺靜農的書法與文學〉：「臺靜農在一九四二年夏天初遇倪元璐書法，與他完成小說《亡明講史》約略同時。我們不難想像，在寫了太多昏君亂臣賊子的荒唐行徑後，臺靜農必然對倪元璐的忠烈心有戚戚焉。我們更可以推測，臺有意藉倪元璐的書法見證其人政治風骨與藝術格調的關聯。」詳見王德威：〈國家不幸書家幸——臺靜農的書法與文學〉，《臺大中文學報》第31期（2009年12月），頁1-46。

<sup>50</sup> 許霖：《鶴唳猶傳建塔心：臺靜農的文學與思想》，頁93。

文人的群像，展現他對知識與文化身分的思考。從文中對錢謙益等歷史人物的尖銳描寫，可以看出臺靜農對於「文」在亂世中的失效充滿遺憾與痛苦。但同時也描繪史可法、殉節乞丐，挽回了文人的尊嚴。

這種焦慮既是個人的，又是時代的。在特定的歷史情境下，知識分子／文人面臨的抉擇往往不僅限於道德與信念，更與生存的現實息息相關。臺靜農透過作品，呈現知識分子在革命、民族存亡與個人價值間的糾葛，並以文學與歷史為媒介，表達他對知識分子與社會責任的深刻省思。他的焦慮來源於對傳統士大夫精神的繼承與現代文化失效之間的矛盾，這既是一種對自我身份的拷問，也是一種對時代局限的無奈回應。

總結而言，臺靜農渡海以前小說中的焦慮，不僅反映了他對於知識分子／文人身份的自我認識與批判，更傳遞了一種對時代責任的深刻思考。無論是對革命的旁觀，還是對變節的批評，臺靜農始終在探索知識分子的角色與價值。在時代洪流中，他既描寫了知識分子的無力感與焦慮，也隱約傳遞出對他們肩負歷史責任的期許。透過本文的梳理，我們可以更清晰地理解臺靜農筆下的文人世界，也更深刻地體會知識分子在動盪時代中的精神困境與人性掙扎。

## 徵引書目

### 一、傳統文獻

漢·司馬遷著、韓兆琦編著：《史記箋證》，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

### 二、近人論著

#### (一) 專書

王可：《王冶秋傳》，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

李德芳編：《瓊崖革命簡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

張仲謀：《懺悔與自贖：貳臣人格》，北京：東方出版社，2009年。

臺靜農：《建塔者》，新北：遠景出版社，1990年。

\_\_\_\_\_：《地之子建塔者》，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

\_\_\_\_\_著、廖肇亨校注：《亡明講史》，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20年。DOI：  
10.978.986350/3996

劉若愚著、杜國清譯：《中國文學理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1981年。

魯迅：《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3年。

〔澳〕Gavan McCormack：《張作霖傳》，湖南：中南出版集團，2014年。

#### (二) 單篇論文

- 王德威：〈亡明作為隱喻——臺靜農《亡明講史》〉，收入《亡明講史》，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20年。DOI：10.978.986350/3996
- \_\_\_\_\_：〈國家不幸書家幸——臺靜農的書法與文學〉，《臺大中文學報》第31期，2009年12月，頁1-46。DOI：10.6281/NTUCL.2009.31.01
- 余英時：〈中國知識分子的創世紀〉，收入《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臺北：允晨文化，2011年。
- \_\_\_\_\_：〈中國知識份子的邊緣化〉，《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總第15期，2003年6月。連結：<https://www.cuhk.edu.hk/ics/21c/media/online/9100057.pdf>
- 柳冬嫻：〈革命發生時的革命文學——臺靜農《建塔者及其它》與1927年的北京革命〉，《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2年4期，頁47-65。
- 徐復觀：〈中國知識份子的歷史性格及其歷史的命運〉，《學術與政治之間》，臺北：台灣學生書局，1985年。
- 許紀霖：〈「少數人的責任」——知識分子的士大夫意識〉，收入《左衝右突——現代政治激流中的中國知識分子》，香港：香港城市大學，2021年。
- 陳平原：〈豈止詩句記飄蓬——抗戰中西南聯大教授的舊體詩作〉，《抗戰烽火中的中國大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
- 舒蕪：〈憶臺靜農先生〉，收入陳子善編：《回憶臺靜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
- 楊儒賓：〈革命文學的興起：個性與階級性的消長〉，《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29卷第4期，2019年12月，頁197-222。
- 廖肇亨：〈「只有漆黑」——《亡明講史》及其相關問題〉，收入臺靜農著、廖肇亨校注：《亡明講史》，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20年。DOI：10.978.986350/3996

\_\_\_\_\_：〈希望·絕望·虛妄——試論臺靜農《亡明講史》與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的人物圖像與文化詮釋〉，《明代研究》第11期，2008年12月，頁95-118。DOI：10.29971/JMS.200812.0003

臺靜農：〈「謝本師」周作人：老人的胡鬧〉，《抗戰文藝》第7卷第6期，1942年6月，頁404-406。

\_\_\_\_\_：〈一九三〇年試筆〉，收入臺靜農著，陳子善、秦賢次編：《靜農佚文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2018年。

\_\_\_\_\_：〈讀「旁觀者」言〉，《文學旬刊》第23期，1921年12月，頁1。

樂蘅軍：〈悲心與憤心——談臺靜農先生兩本小說集中生命情懷〉，收入《意志與命運：中國古典小說世界觀綜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1年。DOI：10.978.986350/4351

賴佩暄：〈論臺靜農舊體詩中的情志、心境轉折與私人寫作：以《白沙草》、《龍坡草》為例〉，《東華漢學》第22期，2015年12月，155-208。

韓侍桁：〈文藝短評：建塔者〉，《文學生活》第1期，1931年3月，頁1-4。

〔美〕Stephen Owen, "Omen of the World: Meaning in the Chinese Lyric," in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 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5.

## （二）學位論文

許霖：《鶴唳猶傳建塔心：臺靜農的文學與思想》，新竹：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論文，2023年。

賴柏霖：《臺靜農先生小說研究》，臺北：世新大學人文社會學院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9年。